

元好问的太原情

张斯直

汾流决入大夏门，汾治移著唐明村。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东阙苍龙西玉虎，金雀觚棱上云雨。不论民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未苦。南人鬼巫好譏祥，万夫毒辐开连茵。官衙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该诗借用历史上宋赵光义焚烧太原城的史实，表达了作者热爱太原、憎恨战争、期盼和平的美好感情。开篇八句，就把太原美景呈现于读者面前，境界开阔，诗句瑰丽，然而这样的美景却因北宋初年的战事而消失了，联想到太原城成为一片焦土，作者十分痛惜，盼望今后重建太原城的心情顿生，结尾句“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表达的就是对太原未来的美好祝福。这首诗慷慨激昂，笔力雄放，感情真挚，如果不是对太原有深厚感情的人，绝对写不出这种况味的诗歌。

再看他在河南三乡时所作的五言律诗《八月并州雁》：“八月并州雁，清汾照旅群。一声惊晓笛，数点入秋云。天没楼中见，哀劳枕畔闻。南来还北去，无计得随君。”

在这里作者借用八月雁子南还，表达了其怀念太原的真挚感情。作者此时暂居河南三乡，秋雁南归吱吱的哀叫声，唤起了他满腹的乡愁，但因战乱只得困居山乡，不能像燕子那样，来回在南北天地间飞翔。既是对战争的无奈，也是对家乡太原的思念。

元好问在太原结识了不少朋友，如寓居太原的崑崙学子王汤臣、太原人李汾、张公著及其子张綽、崔颢。

在元好问所写的诗歌中，《四哀诗》十分著名，这四首七律诗分别写给他的四位同僚。其中第四首诗为太原的王仲泽所作，诗中写道：

“太学声华弱冠驰，青云岐路九霄飞。上前论事龙颜

太原和忻州地域相邻，交流密切。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少名人贤达以他们特有的魅力和魄力，推动太原和忻州文化发展和传承。

元好问（1190—1257），金元时期忻州人。他虽出生在忻州，但却把太原同样视为自己的家乡。他一生多次经过太原或在太原旅居，写了不少脍炙人口、影响很大的诗文，为太原和忻州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好问4岁学诗，7岁在太原拜名家王汤臣为师。公元1203年，元好问的继父元格到山西陵川做县令，元好问随去，并拜陵川名家郝天挺为师，期间多次往返于忻州、太原和陵川。公元1205年秋末，元好问在太原参加举人考试，在太原汾河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摸鱼儿·雁丘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期间多与太原名士刘景玄、吴庭秀、吴庭军往来。公元1214年，蒙古军攻陷忻州，元好问避兵阳曲。1216年，蒙古兵围攻太原，元好问登上悬瓮山，眼望晋阳古城，写下《过晋阳故城书事》。此后，奉母之命，移居河南三乡。在这期间，又写下《虞坂行》《八月并州雁》等诗。1237年，已成金朝遗民的元好问从山东冠氏返回太原，短暂停留后，又回忻州，做诗《羊肠坂》《太原》，作文《兴福禅院功德记》。从此开始，元好问多次到山东、河南、燕京等地，在太原逗留期间，要么与文友相会，要么看望亲人，要么为去世的太原先贤撰写墓铭，同时也为太原写下了不少诗文。这些诗文，表达了元好问对太原的热爱和留恋。

元好问对太原的深厚感情，从他所写的诗《过晋阳故城书事》中可以欣赏、品味到。原文如下：

“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水上西山如挂屏，郁郁苍苍三十里。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

走麦罢

武慧生



夏至过后，酷暑到来，在山西有这样一句农谚：“一年的活路春打头，一年的收成夏打半。”这表明了夏至时节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重要时段。此时，山西大部分的小麦已经收获，夏播工作开始扫尾，农业生产十分繁忙。

在晋南，还有部分地区有夏至过后妇女回娘家的习俗。妇女们不仅将娘家送去用新麦粉做的饼子，向娘家传递自家丰收的喜悦，还为了在收完冬小麦之后回娘家休息放松一下，俗称“走麦罢”。

关于“走麦罢”，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春

薛胄识假

王丹誉

薛胄，字绍玄，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是北周至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他执法公正严明，对百姓特别宽厚，因此享有美誉。

薛胄出身名门世家，父亲薛端，曾任北周的蔡州刺史。薛胄小时候聪明好学，每次阅读新奇的书籍，都能通晓其中深意。他经常感叹某些书籍的编辑、考证和注释者并没有领会古代圣贤的深刻思想，动不动就只是用字面意思随意下结论。因此，当时的读书人，都赞美薛胄治学严谨。他性格热情豪爽，从小就树立远大志向，将来要为国家建功立业。

在北周明帝时，薛胄袭承父亲文城郡公的爵位，一步步地升迁到上仪同的职位（魏晋之后，将军开府置官属者称开府仪同三司），不久晋升为司空大夫（主管全国矿冶和货币铸造的最高长官），后来又加授开府（享受三公待遇）。隋开皇元年（581），隋文帝登基后，他被任命为鲁州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任命为检校庐州总管事；不久，又被任命为兖州刺史。上任时，他看到关押数百名犯人的监狱人满为患，于是用10天时间就审结了历年积压的全部案件，监狱顿时为一空。正因为他处理事情多怀平正宽恕之心，而不是一味严厉，因此有“平恕”之名。

隋文帝开皇初年，陈州有个叫向道力的人，用冒名顶替的作假手段获得高平郡太守的朝廷委任状。这位假太守在赴任的路上，不巧被兖州刺史薛胄碰见。薛胄观察发现，这位赴任“太守”行迹有些异常，想要扣留盘查。他的副手（官取司马）王君馥劝他别管闲事，于是放行。薛胄转念一想，后悔不该放过此人，立即派出自己手下的薄快马追赶，并拘禁了这名伪太守向道力。

正巧薛胄有位部下叫徐俱罗，对王君馥讲述自己的

晋韵

8

坚强堡垒羊角山

乔文龙

晋中市左权县羊角乡羊角村有一座奇异陡峭的山峰，它的形状酷似山羊之角，山下村庄由此得名。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9师很早就在这里建立党组织，组建自卫队，历练后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羊角乡建立了兵工厂，研发了第一桶油墨，试印了第一张抗战钞票，为八路军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切行动听指挥

1937年11月，驻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的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响应中共石拐会议号召，快马加鞭成立“工作团”，派出先遣队进驻各庄村，特别深入晋冀豫三省边界地区的山村，发展党组织，建立根据地。

1938年3月，羊角乡的第一个党支部在羊角村成立。在中共辽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羊角乡建立了武委会、动委会、青教会、妇教会、儿童团、自卫队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及地方武装组织，并坚持党管武装，与晋冀豫其他根据地形成以太行山为依托，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大铁路，南临黄河北岸的抗日防线。

1938年4月初，日军以第108师团为主力的3万余人，分九路向八路军根据地疯狂扑来。4月14日，对辽县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攻，羊角村党组织领导当地武装力量与人民群众开展了空室清野、支前反围斗争。22日，我军收复辽县城，敌人阴谋没有得逞，仓皇北逃。

军民共筑生产线

在羊角山上，八路军129师先遣队在百姓中间发展了许多党员。1938年3月，峰峰煤矿的一批工人在先遣队的指引下，带着锤头、火剪等简陋的机械，来到羊角山麓的梁沟村为前线修理枪械，生产大刀、长矛、石雷、土枪等简单武器。

1940年初，煤矿与昔阳李三窑合并，建立羊角梁沟兵工厂，厂长陈志坚，以及刘有福被称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他们带领兵工厂改进的“八一式步马枪”，集“捷克式”“三八式”及“汉阳造”优点为一体，整体比一般步枪略短，射击相当精确，与敌人进行肉搏战时，刺刀能自动弹出，八路军总部下令批量生产这种步枪。敌人视羊角梁沟兵工厂为眼中钉，于1940年9月、1942年2月和5月三次进攻兵工厂，厂领导陈廉如、警卫营长钟传流在保卫工厂战斗中英勇牺牲。

为了建立更稳固的后方，革命根据地向更偏僻更隐秘的边界山区深入。羊角石灰窑村就是这样一个小小山村，距梁沟兵工厂只有一山之隔，约20多里山路，下羊角山，向西走古河道，入石门峡谷，见一线天即到。1938年8月，羊角石灰窑村来了一支队伍，得到全体百姓拥护，他们天天在山地堰头挖土窑，在地边路边打水窖，打出许许多多土窑土洞，用来隐藏武器和粮食。如果站在河边或者路边，没人提醒，根本察觉不出来。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1939年，常常有30多人的队伍在村里的开阔场地格斗摔跤，练习瞄准。这是在为前线训练新兵，当地百姓都习惯叫他们“教导队”，其实这就是129师教导团的一个训练排，肩负着多重任务。

守护马背上的银行

129师教导团小分队还创造了印刷业的奇迹。1939年6月，129师教导团团长张贤约接到上级指示：尽可能地组织工人，筹集机器、纸张、油墨和版……发行自己边区的票子……为此，张贤约不惜代价，将印钞技师张裕民从邢台监狱救出。

教导团通过地下采购组织，用驴、骡子等原始运输工具穿过敌占区，从天津、新乡、长治等地拉来石印机床、石头印版和上等的好麻。但是，纸、墨的供应问题只能自己解决。于是，战士们就用当地的松香和石灰反复冲刷，用水精心洗涤，造出白白净净的纸。土法制造油墨相当复杂，很多民间高手纷纷出主意，把自然界中的五颜六色印到了纸上。战士们老百姓的帮助下成功地掌握了制造彩色油墨的秘诀，研制出了油墨，生产出的纸和油墨，源源不断供应着抗战钞票的印刷发行，同时解决了华北《新华日报》的材料采购难题。

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成立。1940年春，银行材料发行处材料科正式搬到石灰窑村，129师教导团的保卫任务十分艰巨。上级要求教导团专门拿出一个营，在日军“扫荡”期间，负责冀南银行和印币厂转移的安全问题。银行和印币厂有50多人主要人员，战士们用几十头骡子将票子、机器、币版和纸张分开拉运，在太行山的邢台、沙河、涉县、武安，山西的黎城、辽县、和顺一带和日军周旋。到10月底，百团大战结束，终于完整地把银行的人员和机器交给部队。

羊角抗日根据地，连接太行山与冀南，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是八路军抗战的坚实后盾。

红色记忆

图片来源：百度

17世纪中期，士人群体开始给关公冠上一个新的称呼——关夫子。很显然，这个称呼是比照口语中的“孔夫子”一词来的。“孔夫子”这个词至少在12世纪就已广泛出现在口语中，比孔子本来的称呼更加广为人知。“关夫子”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一部1657年出版的佛教论集中，同一时代出现的还有一个新的关公形象。这一形象有一张不同寻常的红色面孔，三缕长须，身着绿袍，膝盖上还摊着一部书，代表关公所读的《春秋》，这一形象从此流行开来，其流行程度仅次于一手举偃月刀、一手抚摩长髯的传统坐像或站像。

但“关夫子”这个新称呼似乎只在士人群体中流传，大多数人依然继续使用地方习俗中的称呼，特别是“关公”“关帝”或者“关圣帝君”。关公作为文士的新形象，为他在大众中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助力，这也说明士人群体并不想把关公视为一尊仅供平民崇拜的神灵。

关羽的神祇圣迹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方向：他对《春秋》这部儒家经典的研读能力明显在不断增强，最终被大众视为解读《春秋》的大师。《三国志》中有关关羽的传记只记载了他曾给诸葛亮写过一封信。当然无论这封信是亲笔所书还是由人代笔，其内容都早已散佚。

《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大量引用了《江表传》注释相关史事，后者撰于3世纪晚期或4世纪早期，今已散佚。《江表传》中提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这句话对后世关羽形象的建构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这段文字并没有说明历史上的关羽经史水平到底如何，但后世文人却都将其作为关羽精通文学的证据。

无论关羽最初的玉泉山神迹，还是解州盐池神迹，这些故事关注的都是关羽的武力。从宋、金、元至明初，关羽显圣的故事都是以这一要点为中心展开的。不过在1204年的一块庙碑中，作者已经明确将关羽的历史形象描述为一个可以阅读《春秋左氏传》的人。16世纪晚期十分流行的一则故事中有了对关羽“读春秋”更为明确的描述。故事提到，关羽陪同两位义嫂时，夜读《左传》以免扰乱心神。但无论是16世纪早期的《三国演义》版本，还是后世对这个故事的引述都没有说明关羽夜读的是《左传》，可见这点并不是关羽故事传统中的固定要素。尽管“读春秋”早已包含在神祇形象的意蕴之内，但关公崇拜真正系统性地吸纳这一要素并将其纳入文学叙事是明末清初的事情，其背后的驱动力正在于当时士人渴望一个更加文雅、更加士大夫化的关羽形象。

阳泉压饼

压饼是阳泉地区的一种地方风味小吃，当地人称它：“黄金饼，薄如纸，入口碎，嘎嘣脆。”老一辈阳泉人回忆，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个“压饼器”。当夜幕降临，全家人围炉而坐，调一碗面糊，不一会儿就能做出香喷喷、金灿灿的压饼。

关于阳泉压饼有不少传奇故事。唐王李世民的妹妹平阳公主曾率兵镇守位于山西、河北两省交界的娘子关。在某场战役中，娘子军被敌人包围在关内，被切断粮草供应。为了御军御敌，当地村民拿出自家的粮食，用泉水调制面糊，烤制成便于储藏和运输的压饼，供娘子军渡过难关。在村民的援助下，娘子军士气大振，守住了关口，而甘香可口的压饼也流传下来，成为当地有名的小吃。

抗日战争百团大战时，阳泉百姓曾烙制大量压饼支援狮脑山前线。

制作压饼时，先将两片压饼整抹上少许植物油，舀上一勺调好的面糊，倒在其中一片上，然后将两片整压合，以炉台为支点进行翻转烘烤。约一分种后，伴随着浓郁的谷香，黄灿灿、香喷喷的压饼就出炉了。将压饼举起来对着阳光，可以看到阳光穿透薄饼，令整个饼呈现通透的色泽。把饼放进嘴里咬一口，声音清脆，回味无穷。

晋之味

本版综合整理